

十年

汪东林 著

风暴乍起时的政协知名人士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十年风暴乍起时的 政协知名人士

汪东林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京)新登字第 10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年”风暴乍起时的政协知名人士/汪东林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5

ISBN 7-5034-0680-1

I. 十… I. 汪… III.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名人-生平事变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16183 号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北京彩虹印刷厂

装 订:北京彩虹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9.00 字数:200 千字 插页:2

版 次:1996 年 2 月北京第一版 第 1 次印刷

定 价:9.8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本社发行部负责退换。

政协三十年见闻录

政协三十年见闻录
名人轶事 朴初署 政协

政协名人轶事



歷史的借鑑能僅
人清醒，給人以啓
示、智慧和力量。

題記汪季林《政协三十年见闻录》

吴南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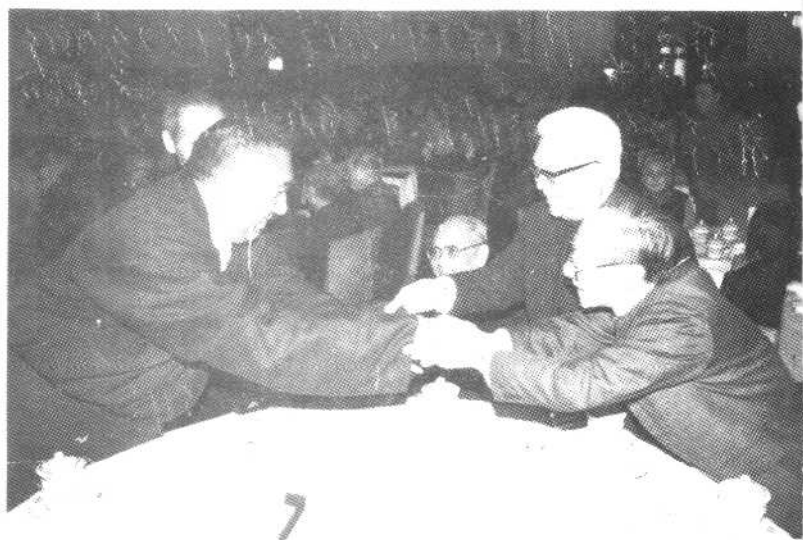


吴南生题词



在1985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上，邓颖超主席到小组看望政协委员时与梁漱溟先生亲切交谈。

爱新觉罗·溥杰(右)和班禅大师(左)在全国政协1986年亲年茶话会上亲切握手，中立者为刘澜涛同志。



在一九八九年三月，全国政协七届三次会议期间，李先念主席来到宗教组看望赵朴初（中）和其他委员。



六十年代初，宋希濂（二排左一）、杜李明（二排右二）、爱新觉罗·溥仪（二排右三）、爱新觉罗·溥杰（二排右一）、唐生明（三排左一）、郑庭笈（三排左二）、范汉杰（后排右二）、廖耀湘（后排右一）等合影于北京前厂胡同五号大院。

一九八八年四月，程思远（左）与邓颖超同志亲切握手。中立者为前明复同志。





沈醉（左）与宋希濂（右）。



一九七九年，杜建时（右）和张学良的胞弟张学铭在一起。



一九八六年，本书作者（左）采访全国政协常委黄维先生。

序

孙起孟

翻阅了汪东林同志的新著《政协名人轶事》（原名《政协三十年见闻录》，在广东省政协《同舟共进》月刊连载）原稿，想起六年前应他的要求，阅读他另一著作《梁漱溟问答录》的稿本。那时我的精力比现在好，15 万字的书稿一口气读下去，饶有兴味。这是因为：第一，从抗战时期的重庆时代开始，我同梁漱溟先生有些接触，在皖南事变后我去云南工作期间，他曾介绍他的学生罗子为找过我，相处一段时间，因此对梁的情况有所了解。第二，作者保存、搜集了大量资料，并通过对梁的直接采访，写事翔实生动，尤其是对“文革”十年（包括“批林批孔运动”）梁先生的“独立思考”、“坚持讲真话”的可贵表现，因当时我受“四人帮”的迫害，完全失去自由，是从汪东林的著作中才第一次知道的，读来颇感新鲜。当然，凡我经历和知道的事，主要是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发生的，我都尽自己的记忆给予补充、订正；记不确切的就提出疑问，建议他去查对史料。后来听说，《梁漱溟问答录》一书出版后，反响较好，由于上述一段因缘，倍觉欣慰。

现在这本《政协名人轶事》的稿本，我是断断续续翻看完了，虽然看得较粗，但我对这本书的内容依然兴趣颇浓，并乐于向读者推荐。

全书以作者自己的见闻为主线，把所写的人和事贯穿在爱国

统一战线的大范围之内，使整体内容仍给读者较为完整、协调的感觉。应当指出的是，该书所写的人和事，主要发生在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这正是我国爱国统一战线受“左”的错误路线干扰，以至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严重破坏的时期。也正因为此，该书从若干不同的侧面，在占有得来不易的史料基础上，真实地记述了这段不寻常的历史，以真人真事证明我国的统一战线，的确是个法宝。这也是本书的可贵之处。此书总题目称为“政协名人轶事”，实际上书中记述到的“政协名人”，可谓名副其实，而所写的“名人”的言论行动，却并非茶余酒后、生活喜好之类的“轶事”，而大多是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的。

本书作者汪东林同志60年代初到全国政协学习委员会工作时，是一位二十出头的刚出校门的大学生。那时我兼任全国政协学委会的领导工作，我与他因此结识，并且成为忘年之交。如果从60年代初算起，汪东林同志在政协的岗位上，也已工作三十年了。看到他一面做好本职工作，一面还勤奋地积累资料，写文章，出书，我作为人民政协这条战线上的一个老兵，感到高兴。因此我愿应作者之请，写了以上这些话，权作该书的《序》。

一九九二年六月七日，在北京。

自序

我从六十年代初跨进全国政协机关的大门，至今仍在《人民政协报》的岗位上尽绵薄之力，算起来已有三十个年头了。我由一名二十出头的大学毕业生，转眼间步入年过半百的行列，这不能不使我发出“惊回首”，“白了少年头”的感慨！但每每遇上政协、统战系统的新同行，他们却常常因此赞说我是—名“老政协”。特别是近十年来我写的《李宗仁归来》《宋希濂今昔录》《梁漱溟问答录》《梁漱溟与毛泽东》等名人传记陆续出版之后，不断受到相识的和不相识的朋友们的鼓励，希望我继续为宣传政协、统战系统的名人——确切地说是历史名人——作出新的成绩。无奈我忙得不可开交，不仅白天全力倾注于报社的编务和活动，而且连晚间也不得不常常加班加点。因此近一、二年来，对报刊的约稿大都辞谢，甚至已经答应出版社的写书任务，也不得不放在一边。

然而，世上的事总会有例外的。1990年9月间，广东省政协《同舟共进》月刊的编者萧蔚彬君不远千里登门拜访，提出他们的刊物上有“灯下话旧”的栏目，专门谈往忆昔的，希望我这个“老政协”为他们撰稿，能搞个长篇连载，则更加欢迎。我的心不由—动。这是因为：第一，我已出版的几本书，不管是传记文学，还是人物传记，几乎都属于“话旧”之列；第二，月刊不同于报纸，充其量不过每月—篇，在写作时间上，总是能挤出来的；第

三，虽然我已经说过许多“旧话”——为梁漱溟、宋希濂、程思远、赵朴初等写过传记——但心中还有着不少的“旧话”想要说；第四，《同舟共进》的读者对象主要是政协统战系统的同行，我若把政协的旧事写得稍细一些，同行们兴许不至于厌烦，会乐于阅读的。

因此我对萧君约稿作了初步承诺——至少没有推辞，但事后仍因忙碌而迟迟没有动笔。不料萧君一个月后又来信“追稿”，词意恳切而颇坚决。这项任务是非“上马”不可了。于是在接信的当晚，便写了这篇开场白，以此向读者作点介绍，同时用自己的鞭子来抽打自己鼓起勇气向前。

如果编者和读者在看完我写的头两篇“灯下话旧”后确有好处的反响，我将继续在灯下奋笔疾书，以较长的篇幅写出我在政协三十年来所知与所见所闻。

目录

- (1)序 孙起孟
- (3)自序
- (1)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开拓者——申伯纯
- (20)章乃器悄然病逝
- (24)马寅初拂袖而去 梁漱溟“善者不来”
- (29)“人无完人”与梁漱溟的困惑
- (40)“科学之事”和“道德之事”
- (52)“十年”风暴乍起时的政协知名人士
- (73)在“1357”
- (90)西河口奇遇
- (100)震撼中国历史的 1976 年(上)
- (115)震撼中国历史的 1976 年(中)
- (131)震撼中国历史的 1976 年(下)
- (150)宋希濂谈瞿秋白
- (171)梁漱溟评述“文革”
- (184)班禅大师回顾往事
- (199)张学铭其人其事
- (212)赵朴初往事杂忆
- (229)宋希濂重结良缘
- (245)沈醉与红卫兵
- (250)秉性固执的黄维将军
- (269)梁漱溟先生拒绝“批孔”誓死不屈
- (280)后记

016/07

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开拓者 ——申伯纯

1959年4月,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闭幕之后,周恩来主席在招待60岁以上的政协委员茶话会上,号召大家将六、七十年来看到的和亲自经历的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变化,几十年来所积累下来的知识、经验和见闻掌故,写下来或口述让别人记下来,传给我们的后代。全国政协常委会随即根据周恩来主席的这一指示,设立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这个机构来负责计划、组织和推动从清末到全国解放各个历史时期中各种历史资料的撰写和征集工作。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政协委员和各界各方的有关人士,响应号召,仅撰写并送交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史料稿件就超过200万字,其中有不少极有价值的 firsthand 资料。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决定编印《文史资料选辑》出版,自1960年1月编辑出版第1期起,除“文革”停顿了10年外,迄今已出版了121辑。如果加上其他史料和专著以及各级人民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征集、出版的各种史料,31年来(实际是21年来),人民政协以其独具的优势,对中国现代史(含部分近代史)史料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所作出的贡献是多么可观、多么巨大!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周恩来主席的指示,政协常委会的决

定，能以这样快的速度、这样高的效率得以落实，并在这样大的范围内得以推广、发展，除了有志于此的成千上万个政协委员和各界各方人士共同努力之外，不能不使人想到最早主持这项大工程的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申伯纯同志。许多经历过那段奋斗过程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赞许道：申老是政协文史工作的一位开拓者！

1963年1月，全国政协召开首次文史资料工作会议。政协机关除文史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全部投入外，还从其他办公室抽调人员参加会议工作。我的办公室负责人通知我我也去参加会议，任务是当小组秘书，即负责一个会议代表小组的记录和简报工作。由于我是才调到政协机关二、三个月的年轻干部，我的顶头上司特别向我介绍政协文史工作的情况。他在强调了政协文史工作的重要性后关照我：

“有些事你知道就行了，要放在心里，不要表露在外，更不要挂在嘴上。文史工作也是统战工作的一部分，这就决定了这项工作也是复杂的、充满着斗争的。特别要提醒你的是，政协从事文史的人员比较复杂，有右派，还有战犯，当然右派大多数已摘了帽子，战犯也获特赦，应称之为‘特赦人员’。他们当中有不少是知名人士。你同他们不可避免地要打交道，要时时记住小心谨慎这四个字。既要讲团结，又要有界限，切不可随心所欲，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你同不同意我的看法？”

我点头称是，毫无保留地把这看成是领导上对我这个新兵的关心。谈话最后，他又关照我：

“这次会议的总负责人是政协申伯纯副秘书长，他也是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日常主持常务工作的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是范老——范文澜同志，他工作太忙，不能经常来。你在会上，有

重要的事情可找申老反映，一般的事请示简报组负责人就可以了。你认识申老——申伯纯副秘书长吗？”

我回答说：“认识。前不久的一天晚上，他在政协礼堂第二会议室召开的政协机关全体干部大会上讲过话，我的印象很深。”我的顶头上司听了一愣，但没有再讲别的，只是连声说：“那好，那好。”

我的印象确实很深。那是一次给申伯纯同志所犯“严重右倾错误”平反的大会。当时，大会的主持人宣读了一份材料，大意是说在1959年庐山会议“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被揭露之后，申伯纯同志曾说过一些错话，党内为此对申开展批判斗争，而申一度态度不好，曾被认定犯有严重的右倾错误，现经组织上查证落实，根据党的一贯政策，申伯纯的错误言论，均属一般政治错误，本人对此已有认识，因此撤销过去的认定，不给予处分，予以平反，云云。

参加这次干部大会之前，就有老同志给我介绍，说申伯纯“资格老，脾气大，思想右”，称得上是一名“老运动员”；他“官越做越小”，“错误却越来越多”；因为是“老资格”，历史上有功，自己又作了检讨，这次才放他过关。

老同志的介绍并非不是事实。申伯纯系北京宛平人，毕业于北京大学，1934年参加革命，1937年入党，早年曾在西北军杨虎城部任交际处处长，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做过重要贡献。后来到了延安，曾任八路军前敌总部秘书长、高级参议，解放后先任政务院秘书厅主任（行政7级），而后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秘书长。这一简历便可说明他资格老，但的确“官越做越小”。那么他是不是“错误却越来越多”，是一名“老运动员”呢？恐怕也是事实。据说他

平时就好“放炮”，什么话都存不住，尽管阅历颇深，却胸无城府；而且脾气很大，动不动就发火，年轻时如是，过了花甲之年也不见有收敛；职务比他高的说他是“目无组织”，比他低的说他是“军阀作风”——恰恰他在西北军军阀部队呆过，因此根子颇深，屡教难改。因有这些毛病，申伯纯自进城以后，几乎每一个政治运动，都是先放炮，后检讨，最后过关，结果是落得个官职不得升迁和“老运动员”的外号。

至于这一次申伯纯的“严重右倾”错误，最典型的言论有三：第一是作为高级干部，他最早听了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反党罪行”的传达，据说他听后如“五雷轰顶”，感叹“昨日之功臣，今日之祸首”，不但私下散布，而且还在会上公开说，分明是为彭德怀“鸣冤叫屈”。第二是“污蔑大跃进”，“给群众运动泼凉水”，“站在群众运动的对立面”，错误事实发生在庐山会议之前的1958年。当时，粮食亩产几万斤，据说一棵大白菜最大的有500斤。申伯纯对此存疑，他亲自到了全国放卫星之冠的河北省徐水县参观，为一棵大白菜500斤与当地陪同参观的基层干部发生争执。他没有见到500斤一棵的大白菜，据说已经运到别处展览去了，但他不罢休，硬要基层干部具体讲一讲使用什么特别的种子和肥料，采取了什么与众不同的措施，才能种出这么大棵的大白菜的；基层干部作了介绍，他不满意，说这些办法都是尽人皆知的，还要刨根问底。如果不是同去的人劝解，很有可能把事情弄僵，弄糟。因为这件事，到庐山会议之后，旁人就联系起来分析批判，说申伯纯为彭德怀“鸣冤叫屈”，其内因之一是申伯纯在思想上与彭德怀一脉相通，即对群众运动泼冷水，否定大跃进的伟大成就，反对三面红旗。第三是1960年国家进入三年困难时期之后，粮食及副食供应都非常紧张，许多人吃不饱已成事实，首都北京也不例外。

申伯纯是部级干部，工资高且有肉蛋之类的为数不多的特殊供应，但他家孩子甚多，不少是正在上中小学的“饭桶”，因此也常常闹“饥荒”，每餐每人按定量吃饭，年幼的常嚷吃不饱。但每逢星期天，所有人在家，有时便敞开供应一次，让孩子们吃足，哪怕是粗粮即北方的玉米面窝窝头管够，全家都很高兴。秉性开朗而直爽的申伯纯，竟把家里的事传到机关，闲谈时他曾对人说，星期天他宣布“窝窝头管够”，没想到“全家欢呼”，有的孩子一口气吃了9个（八两）等等。后来批判他，有人揭发说，申伯纯讲的是家里事，但醉翁之意不在酒，说轻了是被国家的暂时困难吓破了胆，提高点看是一种不满，一种攻击，情绪很不对头，实际上是自我暴露，并以此影响别人。对于上述错误，据说申伯纯只就第一点作过检查，他批判自己怀旧，因为战争年代曾在八路军前敌总部工作过，一直敬佩彭德怀的思想品格、军事才能和杰出的贡献，没有想到竟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堕入了反党的泥坑，听传达后确如“五雷轰顶”，摸不着头脑，因此发表错误言论，实质是自己的立场也站错了位子，影响非常不好，给党的信誉造成损失。而对第二、三条错误，则一直含糊其词，一笔带过。

但在我参加的这次全机关的干部大会上，他在主持人宣读平反材料以后，最后一个站起来发言，却一句也没有提自己的错误事实。由于我是第一次见到他，因此特别留意他的神态。看得出，他是非常激动的。他一头银发，脸色通红，个头又高又胖，嗓音洪亮，右手微微发颤，并不时轻轻敲打着桌面，以加强语气。他缓慢而有力地对大家说：

“同志们！我参加革命28年，入党25年，经历了许多事。在座的也有比我资格更老的，但大多数人比我年轻。我说这些决不是又在摆老资格了。我想说的第一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没